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6.04.003

抗日文学光环掩盖下的文革

——评何顿长篇小说《来生再见》

孙大志

(通化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通化 135002)

[摘要]何顿的抗日题材长篇小说《来生再见》,其写作的重心不在抗日,而在文革;作家关注的不是历史,而是普通人在极端政治条件下人性的挣扎。生存环境险恶严酷的抗战时期,主人公黄抗日能够应用自己的生存哲学虎口脱身,回到家中安静地生活;但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下,他却被逼得装疯、吃屎,家破人亡,生活、人格肢解得体无完肤。作品通过这种对比竖起了一座文革无字碑,形成对文革无言的控诉。

[关键词]《来生再见》;抗战文学;生存哲学;文革无字碑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6)04-0008-04

Cultural Revolution Under the Cover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Comment on He Dun’s Novel *See You Next Life*

SUN Dazh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onghua Normal University, Tonghua, Jilin 135002, China)

Abstract: The writing focus of He Dun’s anti-Japanese theme novel *See You Next Life* is not the Anti-Japanese War, b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writer’s attention is not on the history, but the human struggles of ordinary people under extreme political conditions. The hero Huang Kangri was able to escape from dangers and back to home safely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his philosophy of survival in the sinister and brutal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but 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was forced to pretend to be mad, eat shit, and still ended with his family broken, life and personality mutilated to pieces. Through the contrast, the novel erects a blank stele f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king a wordless complaint against it.

Key words: *See You Next Life*;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philosophy of survival; the blank stele for Cultural Revolution

湖南籍作家何顿是一位容易引起评论界兴趣的作家,执着于写长沙市民生活的他被迅速冠以“新表象”“新生代”“新状态”等“新称号”。然而近期的何顿却转换了笔锋,展现在作品中的场景不再是陈晓明评价的“轻松自如表现他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而是二战时期湖南人的抗战故事。一层历史的薄雾笼罩着何顿的小说,似乎遮蔽了他的才华,饱满细腻的生活细节变成干瘪而生硬的历史叙

述,是何顿厌倦了一贯的创作风格,还是江郎才尽?通过对他的小说《来生再见》的研读与思索,笔者认为,何顿的这部抗日题材小说似乎是项庄舞剑,另有所指。

一 平庸的抗日内容

抗日题材小说紧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从纵向看,抗战时期以鼓动抗战

情绪,树立英雄形象,宣传爱国主义为重点;抗战后至改革开放之前,出于政治需求,抗日题材小说以敌后共产党抗日活动为主要讲述对象;改革开放以后,抗日题材小说涉及内容逐渐扩大。用各个时代的作品名称来概括(并不是指代表作,而是该作品名称具有代表性)可以称为“《虎贲万岁》(张恨水著)时代”“《敌后武工队》(冯志著)时代”和“《战争与人》(王火著)时代”。^[1]前两个时代抗战小说反映的内容相对单纯,而新时期,由于历史资料的不断公开,作品的深度与广度都逐渐加大。

新时期的抗日题材小说开始关注国民党主导的正面战场,对于关键战役,国军将士的正、反两人物都给于了应有的评价。在此期间,小说的重心倾向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抗日战争的还原,由于国共历史遗留问题,解放后的抗日小说基本上屏蔽了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活动,因此对于整个战争的历史还原是新时期抗日小说的首要任务。有全景式回顾的《虎啸八年》(温靖邦著)、《国殇》(周梅森);有描写远征军的如《吾血吾土》(范稳著)、《走出野人山》(毛云尔著)等;有讲述国民党正面战场从退却到相持的关键战役长沙会战的《抵抗者》(何顿著)、《大崩溃》(都梁著)、《滴血的刺刀》(徐晨达著);也有从平民视角,人道主义层面切入,关心战争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如《零炮楼》(张者著)、《温故 1942》(刘震云著)等。

综观抗日题材小说,不得不说何顿掌握的资料宏观上无法与全景式书写抗战的作品比较,微观上无法与讲述具体战役的小说抗衡。他的资料来源于老战士的口述和支离破碎的档案资料,在读这部作品时,会感受到明显的拼凑痕迹。从反映战争对人的伤害而言,同类题材的作品在深度上似乎很难超越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索科洛夫的战俘生涯和对家的憧憬与何顿《来生再见》中黄抗日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肖洛霍夫笔下的索科洛夫有许多震撼心灵的细节和心理描写支撑着,黄抗日在它面前更像是一个扁形人物。此外,与《抵抗者》内容的重复也令人迷惑,是作者江郎才尽,用有限的资料更换包装另售还是有其他的目的?

通读全文后,《来生再见》的创作动机逐渐清晰起来。抗战原来仅仅是一个铺垫,是用来关照文化大革命对人性摧残程度的参照物。在何顿笔下,抗战历程对于塑造黄抗日这个形象来说,作用不在于是否全景再现了长沙会战,是否真实反映了常德战

役,而是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极端的时代背景,在这个背景下,黄抗日犹如被上帝的手操纵着分别丢到了三个不同的政治环境中,每一个政治环境都赋予了他政治身份,从文学形象的角度看,相当于三次投胎作人。

由于何顿写《来生再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表现人性在不同政治环境下的应对方式与生存状态,于是他赋予了黄抗日一种不变的生存哲学。不变的生存哲学与变换的政治环境形成了对抗,对抗考验着黄抗日的生存哲学,检验着它是否是真理,是否有效。在对抗的激化与矛盾的消解中,黄抗日的哲学经受住了考验。然而这种经得住抗日烽火考验的真理,最后却成为用来证明文化大革命对人性史无前例摧残的有力证据。

二 三种政治身份的作用

黄抗日是以国民党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在读者视野的。在他的国民党兵阶段,作者着重表现的是他的胆小与对家的思念。他长得像个猩猩,很猥琐。爹瞧不上他,让他代替哥哥当了国军。一个长相猥琐的小人物就这样被当作替死鬼,不情愿地上了战场。他有心爱的妻子桂花,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活着回家搂着温柔漂亮的桂花,他天天想着桂花,为桂花而活。“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场上,在充斥着硝烟和尸体气味的夜晚,他总是梦见他回到了宁谧、可爱的飘扬着橘树芬芳或泥土馥郁的家乡,回到了他亲爱的女人身边,两人相拥,并发誓一定要生一个英俊的儿子,从而改变他在旁人和父母眼里的形象。”^[2]有着家园憧憬的黄抗日,在这个时候找到了自己的生存哲学——活着回家。安全是他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在战场上,他打死一个鬼子即刻就把脑袋藏在墙后。他眼看着一个又一个骂他懦夫、孬种、胆小鬼的“英雄”瞬间死去,这些谩骂和侮辱没有改变他的人生哲学,反倒强化了它。

在《来生再见》中,这是一段颇具迷惑性的内容。读者按照惯性思维,以为黄抗日会在某个时候经受不住羞辱而奋起,成长为理想中的抗日英雄。然而他没有,不但没有成为英雄,反而被日军俘虏。在黄抗日被俘虏之前的经历中,我们感受最多的,是黄抗日被批为胆小鬼,黄抗日想媳妇,黄抗日在战斗中明哲保身。这三个因素决定了这部小说的整个基调,也在小说的一开头就给出了主线——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

在国民党军队中,士兵是被强征来的,虽然他们也有保卫家园的朴素愿望,但是更多地是被迫服从,这在黄抗日被长官改名(黄山猫改为黄抗日)这一细节中已经体现出来。他们不是自愿保家卫国的义勇军,而是被迫拼凑成的杂牌军,被赋予了名字的农民。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战斗中不可能以职业军人的责任感投入战斗,而是用小农意识保全自己,这是他生存哲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对妻子桂花的眷恋,是支撑黄抗日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家园是他存在的理由;在回家的精神支撑下,活着成为达到这种可能的唯一途径,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黄抗日的表现就是怕死。这三个因素互为因果,但是昭示了黄抗日人格的需求层次。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此时的黄抗日只有安全需求,自尊需求对于他来说是奢侈品,所以他不要自尊,被侮辱、被损害也不会影响他保卫自己的安全需求。

黄抗日被日军俘虏以后,他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从一名国民党兵变成了战俘。在抗日战争的极端条件下,战俘比奴隶的地位还要低下。他完全失去了自由,死亡随时随地来临。这段战俘经历可以说是何顿这部小说的重头戏。一方面中国抗战历史资料中关于战俘的资料匮乏,另一方面有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这样成型的文学作品可以借鉴。但是何顿的笔墨并没有完全用来写战俘的苦难生活,他仍然在关注黄抗日的心理层次。战友马得志的家乡被屠城,马得志的死,都让他自己的家园梦受到冲击,他不敢再憧憬家园,只能退守到求生。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让他感到恐惧,此时的黄抗日心无杂念,只有拼命干活,求得生存。可以说这时的他已经完全退守到动物层面,人的爱、憎、自尊等因素已经不在他的考虑范围。毛领子的同学战死了,他没死,觉得没脸回去见同学的父母,黄抗日却安慰毛领子说,面子比活着重要吗?在他看来,能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活着是他唯一的追求。

在日本投降以后,黄抗日迎来了他的第三个身份,游击队员甚至共产党员。从半自由的国民党兵(国民党军队溃散以后,黄抗日等人已经处于半自由状态,随时可以逃走)到无自由的战俘,再到可以回家但是组织希望他留下的游击队员,黄抗日开始了他的第三个人生。如果说战俘生活是他的人生低谷,完全龟缩到野兽状态;国民党兵时期是他的底层人时期,可以保住安全需求,对自尊没有期许;那么游击队时期是他获得尊重的人格上升时期。

在游击队中,由于他打过仗、会打仗,被任命为游击副队长,成为一支队伍的高级管理人员。这种身份的转换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恰恰相反,是他明哲保身的哲学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游击队作为当时的弱势武装力量,需要把明哲保身当作军事思想来使用,选敌人薄弱处打,避实就虚,情况不好迅速转移等等,这些都是黄抗日骨子里就有的东西,也是他混迹于旧军队中最擅长的东西。游击队生活让黄抗日明确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并确认这种思想是在国民党、日本人、共产党三种政治环境中都可以存活下来的法宝。

三种政治环境中的人生经历让黄抗日坚信,自己的人生哲学是对的。在安全没有保障的时候追求自尊,只能像通讯员、龙营长那样无谓的死去;在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去追求自尊,就会像田师长、马得志那样被当作牲畜处理掉;游击队的生活更加坚定了他的思想。在这三个阶段中作者给黄抗日的人格条件分别定位为:国民党兵时期——属于安全需求层次,自尊需求残缺(在自我肯定与他人否定之间),爱的需求属于理想层面;战俘时期——安全需求残缺,自尊需求没有,爱的需求没有;游击队时期——安全需求有,自尊需求有,爱的需求有。根据已有的条件来看,在国民党兵时期,黄抗日属于需求层次较低的人,战俘时期退化为动物性的人,游击队时期属于中等层次的人。

抗日战争是一次民族灾难,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无与伦比的痛苦回忆。许多家庭在战争中破碎甚至毁灭、消失,黄抗日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以自己独有的生存哲学和顽强的生存意识经过安乡保卫战、常德保卫战、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的硝烟,在日本死亡战俘营中活着爬出来,在残酷的围剿中成为一名游击队副队长。所有这些经历都告诉读者,黄抗日的哲学是对的,是有用的。他不但活下来了,而且真的回到了桂花的身边,回到父母的身边,回到了自己在困苦时支撑意志的精神家园,在生存哲学与政治环境的对抗中,黄抗日是赢家。如果何顿写到这里结束,《来生再见》必定是一部平庸之作,然而,这个大团圆并不是结局。一场真正的灾难即将开始,在这场灾难中,黄抗日的哲学受到了更加残酷的考验,他依旧按照自己的方式应对,可对抗的结果是他活下来了,但是输掉了家园。

三 对文革的深入批判

从伤痕文学开始,对文革的批判虽有高峰和低

谷,但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上世纪80年代的《伤痕》(卢新华著)、《班主任》(刘心武著)、《绿化树》(张贤亮著)到1990年代《后悔录》(东西)、《没有名字的身体》(黄蓓佳著)、《动物凶猛》(王朔著)等,只有宏观与微观、共名与无名的演变,对文革的否定与批判始终属于就事论事、就文革批文革的正面批判。然而何顿却选择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审视文革。他把黄抗日放在文革的审判台上,用我们耳熟能详的文革方式对他进行审判。通读全文,几乎找不到正面评价文革的语言。然而穿插其间的抗战回顾却如同一条皮鞭,一次又一次地打在文革中当权者、操纵者身上。文革给黄抗日造成的精神的、肉体的伤害,与国民党、日寇给他的苦难相比较,更凸显出这场政治灾难的残酷与反人类。

在文革中,黄抗日的第二任妻子李香桃率先遭到批判,她没有屈服,后来被释放回家。接着黄抗日被诬陷为国民党高级特务、汉奸、叛徒,遭到隔离审查。黄抗日对付国民党、日本人使用的生存哲学是为了生存老老实实按照要求做,只要能活命,做什么都可以。只要老老实实地做事,总可以活命。就连杀人不眨眼的日本人,也只对运送炮弹的过程中“偷懒耍滑”、脚步停顿的人开枪。黄抗日拼命地跑,拼命地运,就活了下来。然而在文革中,黄抗日的这一招不灵了。他按照要求原原本本地写交代材料,可这交代材料却如同一圈一圈套在自己身上的绳索,越来越紧地缠绕着他。生活是复杂的,战争是复杂的,黄抗日是简单的,但简单的黄抗日在复杂的生活中顽强地活了过来,这就让它的历史变成复杂的历史。随着交代材料的越来越多,越来越详细,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原本只是怀疑他是国民党间谍,因为他当过国民党兵,谁知他又交代出当过日本战俘。越来越复杂的历史材料让他预感到大限将至,出于本能,黄抗日的生存哲学再一次发挥了作用,启迪了他的思维,让他使出最后一招——装疯。为了生存,他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子。为了让人相信自己已经疯掉,他在屎尿中打滚甚至吃自己的粪便。妻子绝望自杀,儿子孤苦无依,黄抗日只能看在眼里继续装疯卖傻。这时的黄抗日已经跌入人格之下,也就是不再有人格,而是被当作疯子、非人。要承受从内

到外的精神痛苦,做一个有思维的低级动物。这是何等的残酷,造成这残酷的原因就是文革,是文革那种虐心的审判,是文革那种把所有人、所有事都要用革命浪漫主义理顺得清清楚楚的非人的思维方式。

黄抗日在文革中幸存下来了,他的生存哲学又一次保住了自己的命。但是这次他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惋惜与遗憾。他失去了妻子,失去了人格,他作了一次鬼。国民党的征兵抗战时期他是人,是一个胆小怕死的人;日本战俘时期他是兽,是牲畜;游击队时期他是有身份有尊严的人。这些残酷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没有让他变成鬼,而文革做到了。何顿用黄抗日的一生,用抗日战争作背景,用三种政治背景对照文革,对文革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也是另类的批判。这是一部没有对文革进行正面评价的文革题材小说,是文革的无字碑。悲伤需要刻什么文字,什么评价,需要读者在自己的心中组稿。

《来生再见》是一部有深度的作品,究竟是抗战小说还是文革小说,需要评论界更多的商榷,贺绍俊认为它与范稳的《吾血吾土》都属于“打扫战场”的作品,^[3]笔者认为这有点像李健吾对待《雷雨》手稿的态度。简单地把它归于抗战文学是没有真正领会作者的创作意图,而笔者从文革小说入手似乎感到更有道理。总之,单纯地从抗战内容来看,它是平庸的,单纯地从文革来看,它是不深刻的,但把抗战当作背景反观文革,会令人有所感悟。从这个立场来说,《来生再见》很值得一读。

参考文献:

- [1] 李向平.论1990年代抗战题材小说[D].青岛:青岛大学文学院,2008.
- [2] 何 顿.来生再见[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59.
- [3] 贺绍俊.抗战题材小说的新突破[EB/OL].(2015-09-04)[2016-02-08].<http://www.chinawriter.com.cn/xiaoshuo/2015/2015-09-04/252389.html>.

责任编辑:黄声波